

題目：中學教育與社會結構演化的關係一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香港教育服務發展的啟示

前言：社會階層的形成

人類社會，從廣義來看，是生活於整個地球上的全體人類；從狹義而言，則是多個有共同傳統文化、風俗和生活方式的群體，亦即各個不同國家的組合，而每一個國家，亦由大小幾十萬到幾千萬個家庭所結合而成。

人類必須生活於群體之中，絕對不能離群而獨居，而人類最原始的組合是「家庭」。「家庭」在不同的社會和不同的時代，因應著生活的種種條件，特別是經濟條件，產生出不同的生活方式，並發揮著不同的社會功能。

事實上，經濟因素對家庭的社會功能影響極為重要。家庭收入多寡，成員職業高下，使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及階級壁壘分明。韋伯(Max Weber)在《經濟與社會》(英譯本 *Economy and Society*)一書中，認為階級是一群人的聚合，這群人具有相同的獲得財物的機會和表現相同的生活標準。費爾康(A. Vierkandt)在《社會研究》(The Study of Society)一書中謂，在現代的工業化社會中，共同的經濟利益，使得群體形成不同的階級。

一般人都會以家族財富或家庭收入為區分階級的主要基礎，亦即以個人和家庭的收入所能達到的生活水平，決定其屬於何種階級。華勒(W.Lloyd Warner)和龍特(Paul S.Lunt)在他們研究新英格蘭一個市鎮的著作《現代社區之社會生活》(The Social Life of a Modern Community)中，將傳統劃分階級的上、中、下三級，各再分為兩級，共得六級：上上、上下、中上、中下、下上及下下。他們從研究中認

爲：上上級包括出身於「貴族」家庭者；上下級以工商業的新興富家爲主；中上級是金融界的成功人物；中下級由小商人和技術工人組成；下上級包括普通白領工作人員和低薪技術工人；最後的低下級是非技術工人、失業者和貧民。¹ 如果以這六項等級來概略地劃分香港今天的社會階層，也許上上級應是政府及公共機構最高階的官員、大企業家、大財團家族；上下級包括工商業的新興富豪；中上級是金融界的成功人士、專業人才；中下級包括小商家、知識份子；下上級包括普通文職人員、技術工人、低薪職員；而低下級則是失業者、體力勞動者和貧民。香港社會亦出現一種無法劃分是屬何階層的人士，就是投資界別的人士。這一類人，可以隨時向上攀升，亦可以隨時下降，而且壽時甚短、流動性極強。

一、早期香港教育的發展

經濟條件形成人類的階級，而階級則又影響著他們的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包括接受教育的機會。早期的香港，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正規教育以西方教育爲主，而且大部分教育機會由上層富有的社會人士及男孩子所壟斷，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英國政府對香港教育方面不大願意付出更多的力量。在 Anthony Sweeting 的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1: Fact & Opinion" 一書中，作者指出在 1901 年，有八名具影響力的華人向港英政府請願，要求爲尊貴的華人家庭的孩子，成立一所以西學爲主的中文中學。同年，在香港的一些英國社團領袖，亦要求政府成立專門爲歐洲的孩子而設的學校。結果，1902 年，港英政府慫恿何東先生同意將其捐款，用於成立 Kowloon British School(後來改名爲 King George V School)，一所專爲歐洲孩子而設的學校。² 1902 年 9 月 12 日，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Joseph Chamberlain 致函港督卜力爵士 Sir Henry Blake，明確地指出英國政府無意在香港爲華人推廣更全面的的教育，以至無可避免地將貧窮的人拒於教育的門外，這清楚地說明了早期殖民政府對香港的教育政策。

1872 年 2 月 15 日，Frederick Stewart 在他的 "Report on Education, 1871" 中寫出了他對香港教育的看法，他似乎對當時的香港教育感到震驚：大量兒童未能接受教育，其中大部分是漁民和女孩子。他相信普及教育確能改善邪惡，然而，在香港實行普及教育可行嗎？Frederick Stewart 在他的報告中更清晰的表示他對香港教育所感到的徬徨：如果無法令大多數兒童接受教育，將如何解決香港面對的貧窮問題？³ 另外，一位早期南來的著名華人知識份子王韜，也在他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說：香港是一個小島，充斥只會幹買賣賺錢的商人，簡直是一片文化沙漠。他無事可做，無人可與傾談，只好大部分時間留在自己的房間。⁴ 王韜曾

於英國牛津大學推廣萬多冊中文書籍，以向西方宣傳中國文化，看來，這封書信顯示了他因香港知識份子少而感到寂寞，也因未能在香港推廣中國文化而感到無奈。事實上，當時香港中上層社會的華人確實大部分都是商人，他們從沒要求自己的子孫會成為學者，他們只希望子孫可以掌握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及少許英語，以繼承父業或開創新機。⁸可見，當時的香港華人普遍沒有追求西方學問的要求，而低下層的華人更無法接觸教育，尤其是女性。

香港華人女性普遍能接受教育，或許是由西方教會在香港開辦教育開始。英國政府縱使不大願意投放資源在香港的教育問題上，但香港人口卻逐漸上升，由1841年的約5650人，到1842年的約15000人，上升一倍半。到1861年，人口已達到119321人，短短二十年，人口暴升20倍多。1841年的香港華人大部分是漁民和農民，以後十年，大量勞工、技工湧入香港，形成香港人口以成年男子為大多數。這批華人連基本的生計都朝不保夕，又怎能要求他們顧及自己及自己的孩子的教育，更不可能要他們相信女性需要接受教育，於是，直至教會來到香港，開展女性教育，港英政府順水推舟，刻意鼓勵教會辦學。

二、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香港

在眾多來港辦學的修會之中，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St. Paul de Chartres)可以說是屬於比較早期來港的。1848年9月12日，四位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的修女，飽歷風險，自法國航行到香港。抵步後不及一個月，修女即收容棄嬰，大部分為女嬰，並在灣仔成立育嬰堂，於1854年，命名為「聖童之家」(Asile de la Sainte-Enfance)。1856年，修女嘗試在「聖童之家」開辦學校，但只維持了三年，直至1876年才能重開，此即銅鑼灣聖保祿學校的前身。

1894年，香港發生瘟疫，修女竭盡所能照顧病人。當時修女所收容的，不但是兒童，也有很多老婦人，漸漸成為一間像醫院般的救濟所。1898年1月1日，醫院正式開幕。1908年1月6日，修女在跑馬地黃泥涌道(即聖保祿天主教小學及聖保祿中學現址)興建了一間會院名為「加爾瓦略山」會院(Le Calvaire)。由當時的港督盧押爵士(Sir Lugard)主持開幕典禮。多年來此會院成為一所私家醫院以及年老病弱者的庇護所，其後成為一間學校。

1916年，修女決定搬往銅鑼灣棉花路，開始了歷史性的遷移。他們把原有的棉花廠改建為一間修院及初學院、一所孤兒院、一間英法文學校以及一間聖保祿醫院。三十年代後期，修女在九龍半島的太子道開始興建第一座房舍，開辦孤兒

院和診所，其後發展成爲三層高的聖德勒撒醫院。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跑馬地的學校及聖德勒撒醫院被日軍所佔。整座銅鑼灣的建築物也變成爲避難所和醫院。戰爭後期，銅鑼灣的建築物更慘遭悲劇性的打擊：1945年4月，砲彈如雨下，破壞了整座建築物，且炸死了一些修女及孤兒和職員。

二十世紀，香港的經濟日漸繁榮，孤兒院轉爲日間托兒所。踏入二十一世紀，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修女仍然堅持繼續辦學、經營醫院：三所幼兒園和幼稚園、兩所小學、三所中學及兩所醫院，顯示了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對香港社會的貢獻。

一百五十多年來，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修女爲香港的孤兒和婦女提供了無微不至的照料，爲病患者提供了適當的醫療服務，爲學前兒童提供了極佳的訓練，而最重要的是爲香港少女提供了優質教育，爲社會孕育了一些傑出的領袖。

三、聖保祿學校(St. Paul's Convent School)

1856年，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修女於灣仔「聖童之家」嘗試開辦學校，只維持了三年。1876年，在天主教教會神父的鼓勵之下，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修女特別爲當時在香港的大部分英軍的子女而重開這所天主教學校，名爲「法國書院」。1912年2月1日的南華早報，記載了當年的港督盧押爵士(Sir Lugard)在法國書院的典禮上，表示學生全是外籍人士，並都參加了英國本土的考試，證明當年這所學校的學童全是外籍人士，而且屬於上上階層的子女。1916年，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正式遷移到銅鑼灣，繼續擴展學校。

1939年3月14日的南華早報，記載了1937年在法國書院的學生人數爲430人，其中只有少於四份一爲華人；1954年1月26日的南華早報，記載了1952年在法國書院讀書的人數是803人，其中約超過一半是華人；1955年，法國書院正式改名爲聖保祿書院。到1970年在聖保祿書院讀書的人數有993人，超過三份二是華人，其他的有葡萄牙人、印度人、英國人及少量來自東南亞國家的人。有聖保祿書院的畢業生說：當年校刊班級的全體同學照片中，可以發現有些班級有不少於20個不同國籍的學生。1982年，聖保祿書院重新定名爲「聖保祿學校」。直至今日，聖保祿學校的學生仍然保持在每一年級有小量的外籍學生或外地出生的華人，他們可以選修法文，而不修讀中國語文。

從聖保祿學校歷年的校刊中，可以看見早期的聖保祿學校畢業的中學生，大部分都能進入高尚的學府，或往外地升讀大學。1939年，羅富國夫人(Lady Northcote)在學校的畢業典禮上，恭賀了學校的部分學生能進入香港大學。當時香港大學是香港唯一的大學，被稱為「高尚學府」，而那個年代，女性能接受教育實屬少數，更遑論入讀大學。1955年的20名畢業生中，約有6名到美國留學，3名到澳洲，3名到英國，3名進入香港大學，1名到義大利。1970年的50名畢業生，20名到美國或加拿大的大學讀書，1名到澳洲，19名進入香港大學，5名進入香港中文大學。直至今日，聖保祿學校的畢業生，除了留在香港進讀大學之外，其他的仍然會積極到外國留學。可以想像得到，聖保祿學校的學生大部分還是來自上層社會的家庭。

除了學生的國籍或出外留學的人數，可以看得出聖保祿學校的學生階層，從學生的居所也可以估計得到他們的家庭背景。1959年的18名中六學生中，有7名居住在銅鑼灣，4名在山頂，3名住在北角，2名在跑馬地，1名在灣仔，還有1名家住澳洲。1960年的15名中六學生，有5名在跑馬地，4名在中半山，銅鑼灣和灣仔各有2名，北角與西區各1名。1961年的15名中六學生中，4名住在中半山，銅鑼灣、北角和跑馬地各有3名，灣仔和九龍各有1名。五、六十年代的山頂或中半山，甚至跑馬地、銅鑼灣，都應該屬於上層社會的居住地區。這三年的數字顯示了聖保祿學校的學生，大概應有約三分之一屬於上層社會，其餘的二分之一亦應屬於中上層社會。

四、聖保祿中學(St. Paul's Secondary Schoo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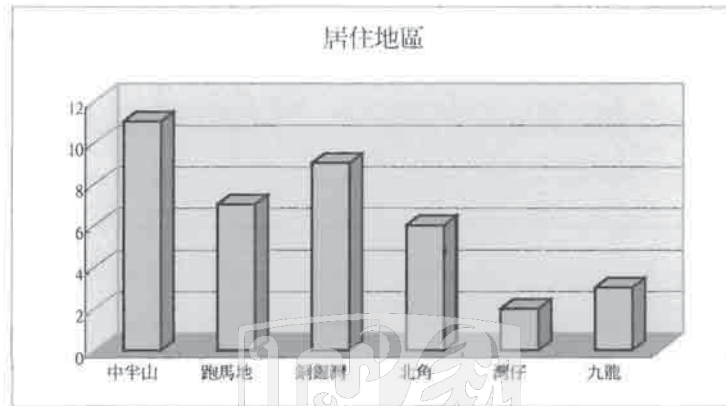
聖保祿中學成立於1960年，由柏立基夫人(Lady Black)主持開幕儀式。早於1908年，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修女已經在跑馬地黃泥涌道興建了「加爾瓦略山」會院(Le Calvaire)，五十年後，因研讀理科之大學預科女學生人數日漸增多，於是修女特在跑馬地「加爾瓦略山」會院原址興辦聖保祿中學，為香港女學生提供理科預科教育。

自開校以來，聖保祿中學除了接收由聖保祿學校轉來的理科預科生外，其餘學生都來自香港各區和社會各階層，但是確實有跡象顯示大部分聖保祿中學的學生都是來自上層或中上層家庭，這些都可以從他們居住的地區及家庭成員的職業中看得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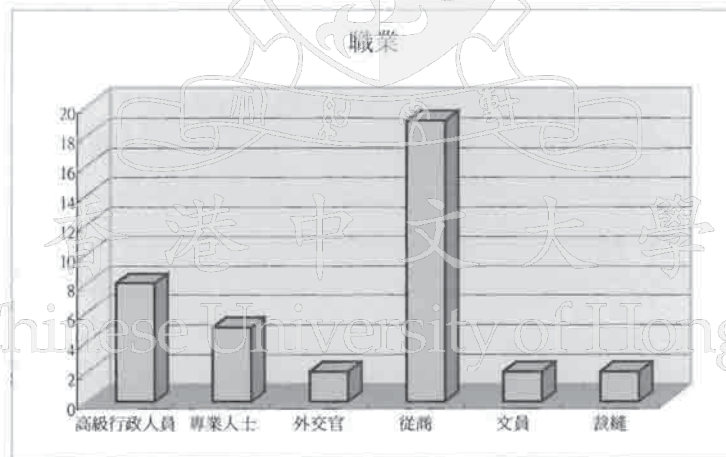
1964年，聖保祿中學有學生762名。筆者隨機在學生的註冊登記卡中抽取

38 名學生，紀錄他們的居住地區及家長職業，其中約三分之一居住在中半山，包括麥當勞道、干德道、寶雲道等；約四分之一居住在跑馬地，其他分散於北角、銅鑼灣、九龍及灣仔。至於家長的職業，約四分之一屬於位高權重的，如大企業的總裁、外交官等；二分之一填寫自己是從商的，而專業人士則包括工程師、醫生等。

1964 年圖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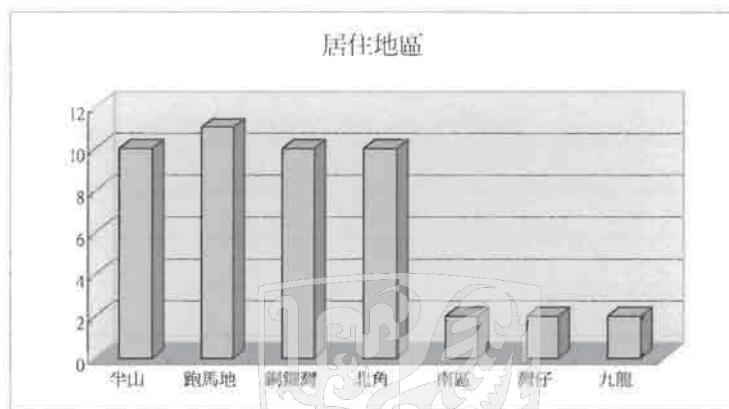
圖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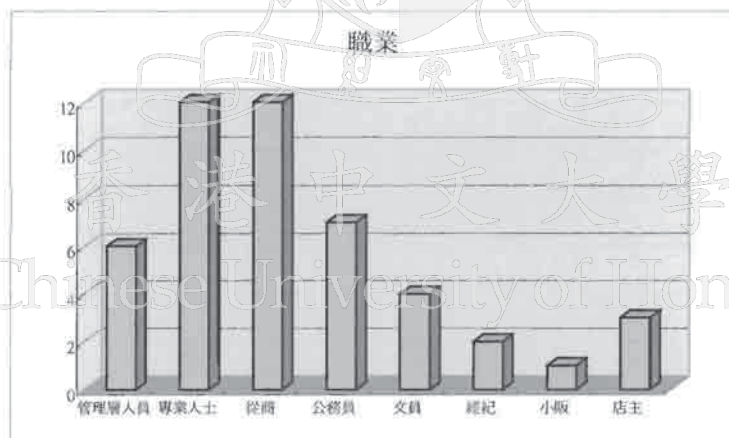
七十年代的聖保祿中學，平均每年都有九百多名學生。1974 年，聖保祿中學有 942 名學生。筆者再一次隨機抽樣取出百分之五的學生，即 47 名學生的登記

卡，發現當中居住在半山、跑馬地、銅鑼灣和東區的分別各佔五分之一，其中居住於東區的實在是屬於當時的中層，甚至可以說是中上層的住宅區，如太古城、錦屏街等。至於家長的職業方面，佔四分之一為專業人士，包括會計、工程師、測量師；六分之一是公務員；另外亦有四分之一是從商的。顯而易見，大部分學生都算是來自中上階層的。

1974 年圖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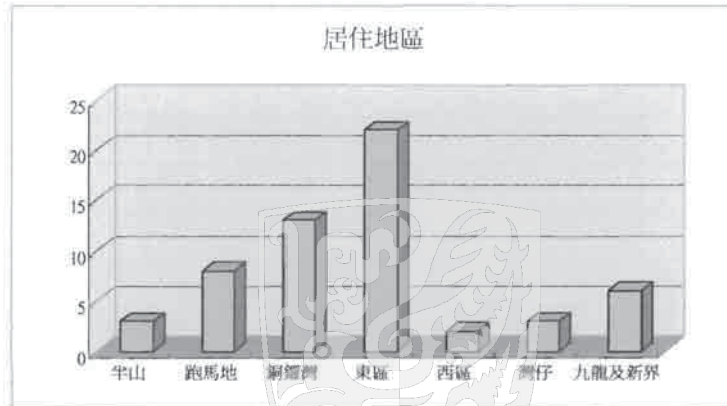
圖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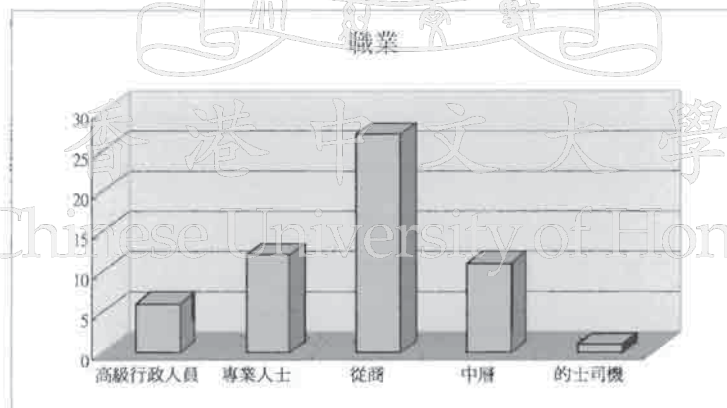
八十年代的聖保祿中學，平均每年的學生人數已經上升至多於 1000 名。1984

年，聖保祿中學有 1136 名學生。筆者仍舊隨機抽取了百分之五的學生數目，亦即 57 名學生，作為調查他們家庭所屬階層的研究資料。資料顯示，學生居住在東區的接近半數，包括和富花園、城市花園、寶馬山花園；居於銅鑼灣的大概佔四分之一，大部分住在天后廟道、大坑道，而居住在半山的只有少於百分之七。職業方面，仍以從商的居多，約佔二分之一；高級行政人員及專業人士分別各佔約九分之一及五分之一。可見這個年代的聖保祿中學學生的家庭階層仍以中層或中上層的居多，而中層的也包括公務員、技術及管理人員。

1984 年圖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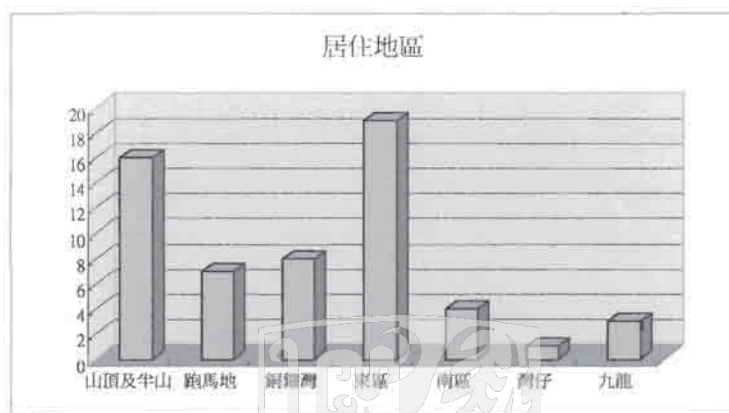
圖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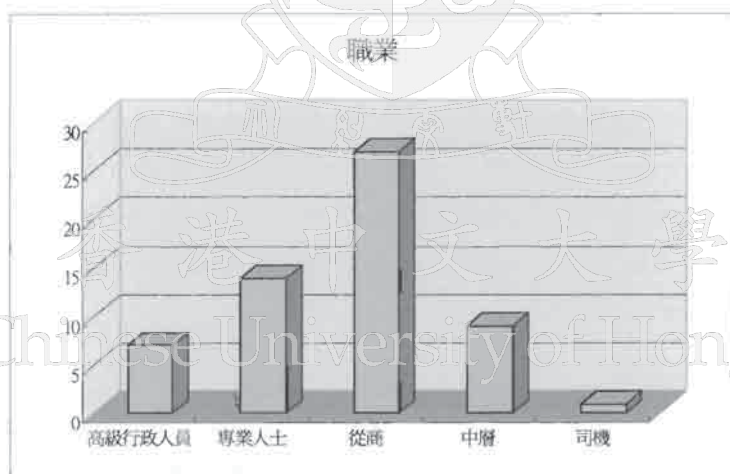
1994 年，聖保祿中學有 1160 名學生。58 名學生中，三分之一住在東區，包

括丹拿花園、鯉景灣，多於四分之一居住在半山或山頂，包括舊山頂道、旭和道。家長的職業方面，除了商界仍高佔二分一外，專業人員仍佔四分之一，高級行政人員及中層的約各佔八分之一及六分之一。中層的包括技術及管理人員、公務員、老師等。

1994 年圖表一：



圖表二：



五、藍田聖保祿中學(St. Paul's School)(Lam Tin)

藍田聖保祿中學創建於 1970 年，為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興辦的第三間女子英文中學。1972 年 5 月 12 日的公教報(英文版)(Sunday Examiner)，報導了藍田聖保祿中學的開幕禮的情況，當年的港督夫人麥理浩夫人(Lady Maclehorse)作主禮嘉賓。麥理浩夫人致辭時說：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早於多年前已經預料於到新市鎮建設學校的需求，所以於 1966 年向港英政府申請撥地興建中學，結果，政府於 1968 年批准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興辦第三間中學。當年政府推出官塘藍田這塊地，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欣然接受，覺得這是最需要學校的地區。修會希望藍田聖保祿中學能秉承校訓：為一切人，成為一切，接納來自官塘或附近其他徙置區的女孩子，讓他們得到就學的機會。1972 年，藍田聖保祿中學遷移至新的校舍，有學生 618 名，全是華人，來自基層的家庭，而且大部分是附近徙置區，包括牛池灣、牛頭角等的女孩子。

1977 年的一份南華早報，報導了早期到藍田聖保祿中學上學的學生，有些像其他徙置區學校的學生一樣，或會穿著睡衣褲(pyjamas)和拖鞋(slippers)上學，他們連一套校服和鞋襪都沒有，可見他們的日常生活是何等困苦。在那個年代，這些徙置區的居民普遍都相信小孩子一旦到達十四歲的年齡，都會進入工廠幹活，從來沒有孩子能上中學，進入大學就簡直是妄想，特別是女孩子。藍田聖保祿中學就提供了這樣一個學習的地方，讓徙置區的女孩子能愉快地掌握知識，學習英語，並得到均衡的發展。南華早報的記者更訪問了一名同學，名叫 Christine Fan。他一家幾口就住在山邊的一間小木屋，每天早上，他必須先行照顧了弟妹才可以上學；放學回家，他也要負責煮飯、洗碗、還有清潔全家的衣服。十多歲的孩子，就是從沒有進過戲院。

筆者也訪問過藍田聖保祿中學的現任副校長賀妙珍老師。賀老師認為藍田聖保祿中學因為沒有附屬小學，所以學生都來自四方八面，約八成半的學生來自中下層，包括牛頭角、藍田、九龍灣、秀茂坪等地的公共屋村。他們的家庭背景比較簡單，父親大部分是工人，體力勞動者；母親多是家庭主婦，其餘是基層的工人，如清潔工人、小販、茶樓女工等。這些學生的父母思想比較傳統，大多認為讀書是子女的唯一出路，也是家庭走出貧窮的唯一途徑。學生的思想也比較單純，他們從來沒有離開過自己生活的社區，別說港島區，就是九龍半島的其他地區都少有有機會涉足；除了家中的飯餐外，他們從沒有出外用膳，更不用說自助餐。

筆者也訪問過一位九十年代初畢業於藍田聖保祿中學的楊詠珊小姐。楊小姐自言他那個年代的同學大部分來自草根階層，住在秀茂坪、牛頭角、藍田的居多，父母多是文盲，只能以作地盤工人，看更等維持家庭生活。而藍田聖保祿中學畢

業的學生有當南華早報的記者、有社工、有時裝設計，也有像楊小姐般的專業人士，如城市規劃。由於藍田聖保祿中學的學生大部分有極高的英語水平，所以即使當年中三後不能原校升讀中四的，也可以輕易的進入同區的其他學校就讀中四，直至會考畢業。至於中五畢業後，未能原校升讀中六的，也可以作護士、文員，基本上是一定有不錯的出路的。

六、教育與社會

從十九世紀中期，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香港興辦學校開始，到今天二十一世紀，整整一個半世紀多。我們可以從她的辦學經歷，看到香港教育的發展軌跡：由只服務少數的上層社會成員，到把教育服務擴展至社會的中層，而最終把教育普及化，讓社會的基層也能受惠。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的修女在 1848 年到香港時，憑著他們微薄的力量，服務的主要對象本來是社會上最低層、最不幸的女孩；及至他們的服務變得正規化，辦學的服務對象便不得不服膺於當時政府的教育政策，開辦了主要為社會上層和外籍女孩而設的聖保祿學校；到六十年代，香港社會的中層日漸壯大，為了滿足中層對教育的需求而辦聖保祿中學；到最後為配合全面教育普及化的政策，把教育服務擴展至為基層家庭的女子而建的藍田聖保祿中學，象徵著修會始終堅持服務社會最低層的可貴精神，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培養香港的女孩子方面確實貢獻良多。

我們亦可看到修會把她的教育服務對象由上層社會擴展到中層社會，整整用了八十四年(1876 至 1960)，但由服務社會中層擴展至社會基層則只用了十年時間(1960 至 1970)。這個歷程亦反映了香港社會在上世紀的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急速的演化步伐。

從這三所中學畢業的學生，其實出路也不大相同。聖保祿學校的學生畢業後多成為商界女強人，或政府高級行政人員，如政務主任，陳方安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聖保祿中學的學生畢業後大部分成為專業人士，如醫生、律師、會計、專欄作家，毛孟靜是一個例子。至於藍田聖保祿中學的學生，始終比較低調和踏實，成為知名人士的較少，大部分是幹文職的，例如教師、社工、文員等。

三所中學接收不同階層的學生對象，造成極之不同的校風與傳統。聖保祿學校始終是貴族學校，學生仍然保留那種高尚的氣質，由於曝光率較高，對外比較

開放、形成學生比較主動、開朗的性格，而且多參與社區的活動，跟社區有緊密合作的關係，如聖保祿學校門外的一條天橋，橫跨銅鑼灣電車路軌，學生就應區議會的邀請，在天橋的階梯上採上歷屆奧運舉辦的年份與城市名稱。跑馬地的聖保祿中學，雖然學生多來自中上階層，而且跟銅鑼灣比較接近，往來較容易，接觸外界的機會亦比較多，但畢竟屈縮於山谷之中，自成一角，形成學生比較被動、閉鎖的性格，與社區的關係亦較疏離。至於藍田聖保祿中學，學生出身草根階層，所以他們相信努力和毅力，結果憑著堅強的意志，腳踏實地，默默耕耘，就單靠他們的學業成績，在他們的社區裏闖出了名聲，成就也絕不遜色。

結語：中學教育的功能

教育是社會階層流動的潤滑劑，教育能提升人類的生活水平。香港欠缺天然資源，香港最重要的資源便是她的人口。香港實施九年免費教育以來，確實能提升整體人口的素質，令兒童擴闊眼界，掌握文化知識與各種技能，提高了香港人的競爭能力，特別是女孩子。踏入二十一世紀，香港女性地位的提高，絕對跟女性擁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有關，因為可以接受教育，得到了知識，能夠找到理想的工作，獲得較可觀的收入，生活上可以獨立，也就不需要依靠男性。於是，傳統家庭的意義也有所改變。遲婚甚至不婚的情況很多，單一人的家庭或兩個人的家庭的數目逐漸龐大，生活負擔減少，水平也就相應提高。

二十一世紀，香港早已進入知識經濟型的社會。人們藉著掌握知識，提高自己及家人的生活水平，帶領家庭逐漸走出貧窮的框線。我們的上一代，憑著辛勤的體力勞動，維持家庭的基本生活；我們這一代，憑著爭取上大學的機會，努力由草根階層爬升上中層；而我們的下一代，必須更努力，在資訊爆炸的知識經濟年代，為掌握自己的命運，創造美好的生活而奮鬥。事實上，必須令社會的所有階層都有接受教育的公平機會，才能保持社會整體的活力與動力，社會才能不斷進步。而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的辦學經歷，正是香港社會變得更公平，更平等的演化過程的一個體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全文完

- ¹ 參考柯尼格(Samuel Koenig)著、朱岑樓譯：《社會學》，協志出版社印行，頁211。
- ² 參考柯尼格(Samuel Koenig)著、朱岑樓譯：《社會學》，協志出版社印行，頁218-219。
- ³ 參考 Anthony Sweeting：“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 1841-1941：Fact & Opinion”，Chapter 4: Consolidation, Conflict and Control 1865-1913, Chronicle 1901 and 1902, pg.215-216。
- ⁴ 參考 Anthony Sweeting：“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 1841-1941：Fact & Opinion”，Chapter 4: Consolidation, Conflict and Control 1865-1913, Evidence 17, pg.276。
- ⁵ Frederick Stewart (1838-89), 首任中央書院校長(the first Headmaster of the Central School)及官校督學(Inspector of Government Schools)。
- ⁶ 參考 Anthony Sweeting：“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 1841-1941：Fact & Opinion”，Introduction, Evidence 12, Frederick Stewart, “Report on Education”，dated 15 February 1872, pg.32。
- ⁷ 參考 Anthony Sweeting：“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 1841-1941：Fact & Opinion”，Introduction, Evidence 13, Letter by Wang T'ao to a friend, in T'ao Yuan Ch'ih Tu (Shanghai, 1893), pg.33。
- ⁸ 參考 Anthony Sweeting：“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 1841-1941：Fact & Opinion”，Introduction, Evidence 20, Extract from F.T. Cheng, East and West: Episodes in a Sixty Years' Journey (London: Hutchison, 1951), pg.47。
- ⁹ 四位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的修女是：Sr. Alphonsine, Sr. Auguste Gallois, Sr. Gabrielle Joubin and Sr. Louise Morse。

參考資料：

- 一、柯尼格(Samuel Koenig)著、朱岑樓譯：《社會學》，協志出版社印行。
- 二、Anthony Sweeting：“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 1841-1941：Fact & Opinion”。
- 三、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12年2月1日、1939年3月14日、1954年1月26日。
- 四、聖保祿學校校刊，1939年、1955年、1959年、1960年、1961年、1970年。
- 五、Sunday Examiner，1972年5月12日。
- 六、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77年，日期不詳。

資料來源：

- 一、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的資料：
訪問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修女 Sr. Josefina；
翻查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圖書館珍藏的舊報章—南華早報及公教報。
- 二、聖保祿學校的資料：翻查聖保祿學校歷屆的校刊
- 三、聖保祿中學的資料：查閱聖保祿中學四年的學生登記註冊卡—六十年代的 1964 年、七十年代的 1974 年、八十年代的 1984 年和九十年代的 1994 年。每一年隨機抽取百分之五的學生作研究。
- 四、藍田聖保祿中學的資料：
訪問藍田聖保祿中學現任副校長賀妙珍老師；
訪問藍田聖保祿中學畢業生楊詠珊小姐；
翻查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圖書館珍藏的舊報章—南華早報。

鳴謝：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修女 Sr. Josefina
聖保祿中學校長黎淑嫻修女
藍田聖保祿中學現任副校長賀妙珍老師
藍田聖保祿中學畢業生楊詠珊小姐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